

◎ 吴方\著

青山遮不住

〔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

東方出版社

B
K203
34

古風遮不住

◎ 吴方\著

【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

以 孺子得拜

同為群牧判官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吴方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60-2412-9

I. 中… II. 吴… III. 文化史-中国-古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3380号

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

QING SHAN ZHE BU ZHU—ZHONGGOU WENHUA DE LISHI ZOUXIANG

作 者: 吴 方

策 划: 刘丽华 侯俊智

责任编辑: 侯俊智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10070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1.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60-2412-9

定 价: 48.00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人民出版网: <http://www.peoplepress.net>

序：一次愉悦而坚实的阅读经历

——兼论官家与中国古代文化

吴 思

一、吴方和这本书

吴方生于1948年，四十四岁时出版本书，三年后因癌症去世。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说：吴方写此书极苦，揣着馒头，成年累月泡在图书馆里。他原本是一个认真的人，这本纵览数千年的大作，简直就是用生命换来的。

展读此书，我的感觉正如他引用的王献之的那段话：“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所谓山，即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所谓川，即吴方给予的各种解说。这些解说往往出人意料，让我茅塞顿开，熟悉的文化现象随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山川自相映发，我的心绪也此起彼伏，随手记下的就有六十余条。这是一段愉悦而坚实的阅读经历。

顺着山川景色的比喻说开去，我近十年来埋头研究“地质板块”，关注暴力和财产之类的硬力量，只问利害关系，不睬风花雪月。看吴方的文化史研究，除了山脉河流之外，还有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秋月春风，比我关注的领域开阔多了，丰富多了，也复杂多了。不过，说到山川走向之类的基本架构，我还可以从“地质学”的角度多几句嘴，算作阅读吴方的心得，或许还能充当本书的导读。至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吴方的原意，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读者浏览之后自能判断。

二、中国文化的姓名

读吴方的文化史，我体会到他写作中的一个困难：核心概念选择的困难。

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数十年来，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封建文化”。这个命名源自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出建国以来的主流历史观。但吴方使用这个概念时很谨慎，我甚至觉得他在回避这个概念。

任何文化体系，必定有一个支配者。如果说西周文化的主导力量是封建贵族，西周文化在各方面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口味，吴方显然是赞成的。他在书中也使用了“周代封建文化”的说法。可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汉承秦制，秦汉文化还能叫封建文化吗？吴方说：“旧的封建贵族势力已在秦汉之际瓦解”，“皇族子弟虽分封王侯，却并无实际责任与势力。”封建势力如此之弱，自然不能成为文化的主宰。可是，不用封建文化这个概念，又该如何称呼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呢？

吴方煞费苦心。书中出现了“强制性文化”、“专制秩序”、“文化专制主义”、“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古代的‘军国主义’”等等说法。吴方说汉朝“主要的文化创造活动围绕着帝国体制而进行”，明朝文化是“国家导向”的，“清代社会的主导文化行为，建设和破除、提倡和禁止，都是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模式内塑造的”。

这么多说法，到底有没有一个统称呢？吴方没有给出来。这本书1992年初次出版，至今十四年过去了，中国学人虽然提出过“皇权专制主义”等概念，但公认的称呼仍未形成。

假如吴方活到今天，修订再版这本书，我会建议他考虑我找到的概念：“官家主义”。我认为，秦汉以来，在中国“主义”的，说了算的，起主导或支配作用的，正是官家集团。中国古代是官家主义社会，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是官家文化。

官家，《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 旧时指官府。2. 古代对皇帝的称呼。《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还包括：旧时对官吏、尊贵者及有权势者的尊称。

在这个概念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皇权，也可以看到各衙门的部门利益，还可以发现官吏们的个人私利。这三者之间既合作又争夺，形成各自的地盘，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立法定规。官家概念的多义性，使我们既能确认整体特征，又能拆解内部结构。

官家集团是由暴力集团发展而来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的创建者都

是某种暴力集团的首领，他们率部打天下，然后称帝封侯坐江山。皇家贵族再雇佣代理人即各级官吏替他们治理天下。官家集团掌握的核心资源就是暴力。“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在中国历史上通行的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保证了官家在社会文化秩序方面的主导权，至少确保了否决权。

三、主导者如何发挥作用

官家集团如何主宰文化的发展？吴方有详细的描述。

商鞅三见秦孝公，第一次讲“帝道”，说得孝公直打瞌睡。第二次讲“王道”，即德政那一套，孝公仍不感兴趣，以为不切实用。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语数日不厌”。吴方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官家集团的首领，如何在比较中选择了法家文化。反过来，如果谁抗拒改造，官家可以使用暴力，“焚书坑儒”，直截了当地剪除异己。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体现了官家的选择：皇帝认为儒家最有助于长治久安。可见儒、道、法，连同外来的佛教文化，都在官家文化的统摄之下，其兴衰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家选择的结果。

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读书人的行为。这是官家选拔代理人的制度，考试内容则体现了官家的意识形态主张。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弥漫于官场内外，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尊奉这种价值的，可能名利双收；背离这种价值的，很难逃脱贫贱的命运。

在比较软性的艺术领域，官家的支配作用依然强大。

吴方说，汉朝艺术以讲究富丽矜夸的宫廷尊贵需要为主导，如绘画和大赋。元朝的艺术风格，由清雅转向粗犷的华丽装饰，体现了游牧民族统治集团的口味。

官家搞文化的优势在于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擅长搞工程，例如紫禁城、颐和园、御用瓷器、《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等。耗费巨大的文化工程只有官家才搞得起，官家的文化工程，也往往具有壮丽、雄伟、宏大而精致的特色。

清代考据和文字学的高度发达，一方面起源于对明朝空疏之学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官家“文字狱”的抑压。两股力量会合，形成了清朝在规范和约束之下发展的精神世界，狭窄而深入，繁缛，堆饰，拘谨，精细，虽不能开辟文化新天地，却把前人开创的事业做得细致完美。

在官家集团内部，士大夫的文化创造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用诗词散文等形式，表达了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精微的人生体验。即使晚唐的诗风，悲凉颓唐

士大夫人生哲学

的意境，唯美与享受的风气，在吴方看来，也是被迫内向开掘的产物，折射出政治进路的挫折和无奈。

士大夫充满矛盾的人生体验还培育出富于中国特色的哲学和宗教。

吴方说，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分为两部分而互补、进取和退隐，人世与出世，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好像天平的两端时时摇摆，禅宗正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支持。老庄关于出世的思想，也成为士大夫人生进退、心理平衡的重要环节，形成儒道互补的基本模式。

士大夫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既有时代性和阶级特色，又包含了人类共通的深刻经验。

四、官家之外的创新

吴方这本书，我读到元朝，经过多次重复，才意识到内在的路数。在他的笔下，每个朝代都面临一个问题：谁在选择文化？谁需要？谁供应？谁主宰？

譬如元朝，贵族统治集团自然是文化的主宰者。但在他们之外，市民也需要娱乐，都市平民对戏曲和说书有浓厚的兴趣，而读书人的传统仕进之路几乎断绝，于是，大量的文人进入戏曲创作领域。有需求又有高水平的供应者加入，元曲便雅化、深化，形成一座文化高峰。在仕进之路断绝的背景下，元朝的文人画自写胸中丘壑，求神似不顾形似，也达到了隐逸之气的高峰。

明朝的市民和市井，产生了成就甚高的戏曲和小说，这些都是新东西。尽管新得有限。毕竟中国的市民尚未长大，新的文化也长不大。清朝的开创性文化成就，或是前朝遗民创造的，或是西方激发的。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聊斋志异》和《红楼梦》，都是官场之外的富于叛逆性的产物。

从源头说起，《诗经》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民间歌谣。春秋战国王纲解纽，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中国便进入了最具文化创造力的时期，百家争鸣，孔夫子就是第一位一鸣惊人的民间教育家。秦汉大一统，文化成就乏善可陈，民间的汉乐府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那时的文化精粹。魏晋南北朝又是官家控制能力薄弱的时代，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学发展的一座高峰。

除了各种民间力量，非官方的力量还包括外来文明的影响。佛教文化自不必说，西部和北部各民族的音乐、歌舞、饮食、服饰、建筑等等也全面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科学、民主、大工业、现代化，都是中国文化之外的新东西。中国文化史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开始了新篇章。

五、王朝循环问题

这本文化史追溯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和在此基础上孕育的心理体系，包括风俗、道德、法律、信仰、知识、艺术等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例如生产工具，农耕技术，在千年的时段内大体是稳定的。这部分内容，吴方主要放在先秦部分讨论。秦汉之后重点就转向了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两百年左右重组一次，形成醒目的王朝兴衰和治乱循环，吴方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定势”。

为什么会有这种循环？官家主义的说法可以解释一半。

如果把汉朝比喻为一家股份公司，皇帝就是最大的股东，就是董事长。追随他打天下的贵族就是小股东。皇家贵族雇佣官吏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即大大小小的经理。官家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于：“条条块块”和各级代理人，都倾向于扩张自身权力。在与皇帝的博弈中，衙门和官僚个人掌握着实际管理者的信息优势，皇帝难以约束他们无孔不入的私利扩张。于是，谁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闹独立，闹分裂。只要有军队，就可以明目张胆地闹。没有军队，也可以阳奉阴违地闹，把中央集权闹得四分五裂，名存实亡。

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可以看作官僚代理人闹成贵族股东的代表。他们借九品中正制操纵用人权，进而把持政权，成为占田受赐的世袭性股东，豪门士族也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主导者。科举制推行之后，门阀士族的用人权削弱了，门阀制度在中国渐渐衰落，中国社会便有了更重的平民色彩。

唐朝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可以看作官家主义中衙门即“条条块块”闹出的成就。各地军政大员大权独揽，军队对他个人效忠，权力世袭，“条条块块”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王国，经理们成了一个个小老板，进而觊觎大老板的位置。清帝退位和民初军阀混战的直接原因也在这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无论官家集团的哪一部分闹，最终目的还是瓜分地盘，占有民间创造的财富。儒家本来已经划分好民众与官家集团的利益边界，但在部门利益和潜规则的逐步侵蚀下，甚至在皇帝本人的侵犯下，边界的实际位置越来越偏离均衡点，生产集团最终承受不了官家集团的重压，流离失所，揭竿造反，社会秩序于是崩溃。

总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家主义的内部矛盾和潜规则的存在，可以精确地解释“合久必分”：官家集团内部的均衡逐步遭到破坏，官家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均衡逐步遭到破坏，皇帝和民众都无力抵抗

权力实际使用者弥漫不断的蚕食，社会秩序必然走向崩溃。这种规律甚至可以借助博弈论用数字计算出来，我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书中做过尝试。

可是，为什么会有“分久必合”？在乱世之中各个暴力集团彼此竞争，某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吞并群雄，一统天下，似乎有很大的偶然性。长久分裂下去，甚至像欧洲那样以分裂为常态，应该很有可能。那么，中国为什么统一过那么多回？这里是否需要引入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因素？儒家之道是否发挥了重大作用？吴方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透。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史还将写下去，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还将继续深化。

2006 年 12 月 11 日



序：一次愉悦而坚实的阅读经历

——兼论官家与中国古代文化 (1)

吴 思

一 远 古

(约公元前二千年以前)

1.1 文化史题解 (2)

1.2 沧桑大陆 (4)

1.3 石器时代与史前传说 (7)

1.4 早期农耕文明 (10)

1.5 远古神话与宗教 (13)

1.6 陶文化演变 (16)

1.7 原始艺术·王权·巫术 (20)

二 夏·商·西周

(公元前二千年——公元前七七一年)

2.1 有无夏文化 (26)

2.2 青铜时代 (29)

2.3 殷商艺术与天人通感	(33)
2.4 西周礼乐文明制度	(36)
2.5 古文字初始	(40)
2.6 商周文化体制	(44)
2.7 “风、雅、颂”	(47)
2.8 《周易》的世界观	(51)

三 春秋·战国

(东周，公元前七七一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3.1 周室东迁与王纲解纽	(56)
3.2 春秋战国之际的商业与城市	(59)
3.3 技术主义时代	(62)
3.4 “春秋无义战”	(66)
3.5 教育与学术：由官学到私学	(70)
3.6 “士”之兴起	(73)
3.7 竞争中的改革	(77)
3.8 兵家思维	(80)
3.9 衣冠·名教·家族	(84)
3.10 “阴阳五行”	(86)
3.11 孔子与儒家思想	(88)
3.12 墨家·法家·道家	(92)
3.13 楚文化宗风与屈原	(96)

四 秦·汉

(公元前二二一年——公元二二〇年)

4.1 秦始皇统一中国	(102)
4.2 专制秩序	(105)
4.3 汉高王道	(109)
4.4 汉初之治	(111)

4.5 汉武帝功业与传统政教体系确立	(115)
4.6 社会风俗	(118)
4.7 丝绸之路·北方边患	(122)
4.8 容纳百川	(125)
4.9 两汉神学	(130)
4.10 东汉文化兴衰	(134)

五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公元二二〇年——五八〇年)

5.1 由汉末动荡到三国鼎立	(140)
5.2 魏晋文化冲突	(143)
5.3 玄学与清谈	(147)
5.4 士林情怀·文苑风度	(151)
5.5 南北朝	(155)
5.6 本土道教	(159)
5.7 佛陀东来	(162)
5.8 儒、道、释的冲突与融合	(166)

六 隋·唐·五代

(公元五八一年——九六〇年)

6.1 统一与“大运河”	(172)
6.2 贞观之治	(175)
6.3 唐代教育与科举制度	(179)
6.4 风气开放	(182)
6.5 盛世荣华	(185)
6.6 唐诗的意象世界	(189)
6.7 佛教本土化及禅宗兴起	(194)
6.8 禅意·隐逸文化·敦煌艺事	(198)

6.9 中唐思想文化的融合嬗变	(202)
6.10 绘画与书法	(206)
6.11 内忧外患	(213)
6.12 “安史之乱”以后	(216)
6.13 民俗韵致	(219)
6.14 晚唐及五代十国	(224)

七 宋·辽·西夏·金·元

(公元九六〇年——一三六七年)

7.1 兴隆北宋	(230)
7.2 “瓷”的时代	(233)
7.3 科技与教育	(237)
7.4 理学	(241)
7.5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	(244)
7.6 宋词	(248)
7.7 俗与雅	(251)
7.8 略说辽、西夏、金的文化	(256)
7.9 南宋偏安	(259)
7.10 元朝杂色	(263)
7.11 元画与元曲(剧)	(266)

八 明·清

(公元一三六八年——一九一二年)

8.1 明初秩序格局	(274)
8.2 权威与事功	(277)
8.3 “国家导向”与工艺器物	(280)
8.4 明中叶社会生活演变	(284)
8.5 市民文化	(287)

8.6 常规与突破	(292)
8.7 晚明动态	(295)
8.8 清帝国	(300)
8.9 实学思潮及清代朴学	(302)
8.10 康乾盛世	(306)
8.11 踵事增华天朝梦	(309)
8.12 兴亡之感	(314)
8.13 西方文化冲击波	(318)
8.14 晚清历史大变局	(321)
8.15 艰难的选择	(324)

引用及参考书目	(329)
---------	-------



一 远 古

(约公元前二千年以前)

- 1.1 文化史题解
- 1.2 沧桑大陆
- 1.3 石器时代与史前传说
- 1.4 早期农耕文明
- 1.5 远古神话与宗教
- 1.6 陶文化演变
- 1.7 原始艺术·王权·巫术

1.1 文化史题解

距今一千三百余年前，大约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好时候，即史家所称的“盛唐”。那时有位诗人张若虚，作了一首《春江花月夜》。这首诗，由于韵境优美，后世吟咏弦歌不绝，不过，在这儿提起，主要倒不是因为这首诗的文学描写。可能不同于一般的写景抒情，很难说是否缘于一种灵感，诗人面对春江花月，却发生了不易回答的问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人生何来何去？古今代谢的奥秘又在哪里？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对人生与自然的关系在做着叩询，虽然不免有些朦胧的直感，甚至于思无所依——“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大约，这种情形也正是促使人们去进行文化史追溯的原因吧。

中国文化史追溯的目的，当然是试图描述一番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程。不过这相当不容易做好，它属于探索不尽的对象，更何况不免如古诗所谓“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妨也就应该承认，任何文化史追溯都还是有限的了解，虽然了解的范围和程度在扩大和加深着。

显然，由远古至今，沧海桑田，眼前的世界，整体的生态环境已经由于人类的参与活动，由于人类与其所处的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经历了巨大变化，我们的感觉趋向于逐渐加快的变化节奏，便以为“日新月异”实在是不足为怪。因此，历史，总的看确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文化”乃是一包容广大的概念。《易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似意指种种天地人伦间的关系以及凝结的迹象，而说到“文化”，则意指种种关系衍存推移之过程了。）使个理论味儿稍浓的词汇来说，也就是有个“自然的人化”与“人的对象化”，两个方面叠合在一起。再用个比喻来形容，文化的过程，即文化史所追溯的对象，有些像溪河江湖、峰原陵谷自然形成的网络系统。可以说，每一种文化事实，简单或者复杂，又都在系统的关系中，都是无穷无尽的大网上的一小部分。

再具体说，关系确实复杂：文化过程之中，无论是历史生活的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是先天行为还是后天的习俗，重要的是环境条件还是人的自由意志与



选择,文化变动的方式是突变还是渐变,等等多元因素,需要考虑的方面,有时还是矛盾的,又都互为关联,曾经发生或明显或隐晦的碰撞、交汇以及嬗替演变。时间长了,对一个民族或传统地域来说,就会逐渐形成有较稳定“核心”、“基质”的传统风格——文化类型。追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历程,也不外乎是。

头绪万千,而且追溯的努力,不免有成语所谓“雪泥鸿爪”的情形。虽然不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地步(尽管岁月淹没了不少历史消息,前人还有不少文化史料留存下来),但描述和解释之中,一定有确定性的和不确定性的矛盾。不过,大致也可以说,主题还是清楚的。

文化史追溯的基本主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为一种广大的文化生态圈,后者则为社会生活秩序。接着,在此一基础上又孕生了不同民族及地域的心理体系,还有,也包括风俗、道德、法律、信仰、知识、艺术等精神方面或“心物相关”的现象在内。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文化史阐述的关键,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它或明或暗地贯穿在文化史程途中。也许,主题的浮现,有助于在纷纭大千的文化史景观中了解历史发生发展的线索,也不妨当做省察的焦点。

粗看,人与自然之关系这一主题,是不是很重要呢?英国考古学家林·伦福儒对此问题说过一段话:“一个文明的生长程序,可以看作人类之逐渐创造一个较大而且较复杂的环境,不但通过生态系统中较广范围中的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在自然境界中如此,而且在社会与精神中的境界亦然。而且,虽然野蛮的猎人居住在一个在许多方面与野兽没有什么不同的环境(纵然这个环境已为语言的使用以及一大套的文化中其他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而文明人则住在一个差不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他用来将他自己从纯然自然的原始环境隔离开来。”(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

这一看法表明:文明与野蛮(蒙昧)的不同,或者说文化过程与自然过程的差异,关键在于,人对自然原始环境的超越,换言之,文明人开辟了创造性的生活,开辟了重新塑造自己、改变人与自然原始关系的途径。这一途径又意味着,它是在技术和贸易经济的新环境(包括生产工具、方式及社会组织结构的进化)中形成的。这一认识,大体抓住了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有启发性,但是由于还只是发自对西方文化史轨迹的体察,未必普遍适用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